

【论 文】

二重的中国

——1930年代的新疆问题与近代国家的“边疆”意识¹

王 柯

进入193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讨论和研究“边疆”问题的热潮，它标志着中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所面临的“边疆危机”在30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需赘言，这与9·18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有着直接的关系。²本章的目的，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疆内部和外部形势为背景，通过分析当时中国政府关于新疆政治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和和中国知识界就新疆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探讨近代中国有关边疆思想和“边疆危机”的发生机制、构造性原理和性质，并从地政学的角度考察日本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对中国国民强化近代国家“边疆”意识的作用，进而从这些围绕着“边疆”所发生的具体行动和思想中，发现在近代民族国家条件下中国传统国家意识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意义。

1. 二十世纪初期新疆的政治独裁体制与“新苏关系”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当时的新疆省首府乌鲁木齐曾经先后发生过两次政变，导致了新疆最高权力的交替。在1928年7月7日的政变中，新疆省省长兼新疆边防督办杨增新被军政厅长樊跃南暗杀，负责镇压政变并杀害了樊跃南的新疆民政厅长金树仁随后就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边防督办。1933年4月12日，参谋处长陈中等人策划政变，将金树仁赶出新疆，新疆省政府军东路军总指挥盛世才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有人指出，新疆最高权力的交替，“历来都是通过‘藩镇政变’的形式来实现的”。³因为从杨增新到金树仁，再从金树仁到盛世才，新疆政权的两次交替，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插手其中，只是无奈地在事后予以追认，补上一道手续而已。这种政权交替的性质，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杨增新时代（1912—1928年）和继杨增新之后的金树仁时代（1928—1933年），新疆省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性质。事实上，在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以后，新疆的最高统治者杨增新、金树仁，一直保持了在政治上的独立。⁴

然而应该看到，这种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政治上独立的局面，并不仅仅是由地方军阀人为造成的。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在财政上对新疆进行支援，新疆在经济上对中国内地的依赖程度也大大下降。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相对独立的新疆经济和财政体系的形成，在客观上造成了新疆省政府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依存度的下降，支持了新疆省当局在政治上的独立。随着清王朝的垮台，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由清王朝中央政府拨给或从各地调拨、被称为新疆

¹ 本文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历史认识》第七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231—264页）。

² 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91—113页，原载《边政公论》第一期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³ 吉人：《今后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4年二卷21期），第3页。蒋默掀：《新疆政变又揭开一幕》（《时事月报》1933年九卷二期），第62页。

⁴ 关于“政治的独立”一词，参照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第99页。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神近市子訳、岩波書店，1940年、第12頁。蔡锦松、蔡颖：《1933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盛世才争夺新疆统治权的斗争》（《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一期），第72页等。



财政命脉的每年大约 300 万两的补助金（协饷）突然中断。¹杨增新不得不在当地采取增税、大量发行纸币、振兴实业、开垦农地、整治地方贪官污吏等手段，在建立以自力更生为目标的新疆财政体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²但是，由于军事预算庞大，³新疆省政府一直没能摆脱巨大的财政赤字。到 1922 年，根据当时的统计可以得知，新疆每年的财政支出都远远超过了财政收入。⁴

在这种情况下，杨增新于 1920 年重开了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即所谓新苏贸易，从 1923 年起飞速成长，在新疆建设独自の财政体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⁵也有人从苏联的经济侵略这个角度来论述新苏贸易。⁶但是很明显，新苏贸易不应该简单地看作是单方面的经济侵略。因为，新疆省政府将新苏贸易看作一个确保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积极参与并且推进促成了此事。

从俄国革命到 1920 年之间，杨增新曾经禁止过新苏贸易。杨增新在 1919 年 7 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到了禁止新苏贸易的理由在于，与帝俄俄罗斯之间尚存在着不平等条约。“条约改正之前，再开通商的话，对地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利少而害多”。其利害在于，“彼进我境准暂免税，我进彼境则课以重税”。⁷1920 年 5 月 28 日，杨增新派伊犁道尹许国祯作为代表与苏联方面签订了《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这个被称为“中苏（俄）间第一个平等条约”的协定，废除了过去俄国商人所享有的关税免除及治外法权。⁸杨增新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新苏贸易来增加关税收入，以贴补新疆的财政。实际上，关税收入很快就成了新疆省政府的最大的收入来源，其数额甚至占到了年财政收入的 23%。⁹

新苏贸易再开之后，其贸易总额年年递增，很快就超过了新疆与中国内地、印度、阿富汗的贸易额。以 1927 年为例，新苏贸易总额为 27,410,000 卢布，而与此相对，新疆与中国内地的贸易总额仅为 2,509,000 卢布，还不足新苏贸易的十分之一。当年，新疆与印度的贸易总额为

¹ 据齐清顺的文章介绍，清朝每年给新疆的补助金约二百五十万两（齐清顺：《清代新疆的协饷和专饷》《新疆历史研究》1985 年一期，第 64—65 页）。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曾一度全部取消了对新疆的补助。从 1913 年开始，中央政府又决定给新疆财政每年补助银元六十万元，但由于内乱的缘故，这项补助也曾数次中断（陈延祺：《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一期，第 100 页。陈慧生：《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财政金融》《新疆历史研究》1985 年三期，第 97—99 页）。

² 关于杨增新的财政政策，有很多论文。这里主要参照陈延祺和陈慧生的论文，以及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新亚细亚》1934 年七卷四期，第 21 页）。

³ 1917—1922 年的新疆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平均占 7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地方志委员会版，第 687 页；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新亚细亚》1934 年八卷二期，第 39 页）。

⁴ 新疆省 1917 年的财政收入为 4,745,800 元，而当年的财政支出为 12,876,647 元；1922 年的财政收入为 7,480,124 元，当年的财政支出为 52,374,646 元（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9 页；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 686—688 页）。

⁵ 只有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主席褚民谊认为，杨增新政权之所以能解决财政困难并存续下来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来自新苏贸易的关税收入及打击地方官吏的贪污（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3 年三期，第 84 页）。

⁶ 将新疆与苏联间的贸易称为苏联的经济侵略的论文有很多，如：李钦文：《新疆之经济状况》（原文《新亚细亚》，1932 年四卷二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历史资料集》五，第 901—911 页）、慕宁：《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新亚细亚》1933 年六卷五期，第 41—50 页）、罗君素：《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新中华杂志》1934 年二卷十八期，第 29—34 页）、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新亚细亚》1933 年六卷五期，第 25—30 页）、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新亚细亚》1934 年七卷二期，第 49—54 页）、张觉人：《新疆与苏俄之贸易》（《天山月刊》1934 年一卷一期，第 35—50 页）、王飞：《新疆商业之危机及其补救的方策》（《西北向导》1936 年二十号，第 387—391 页）、王醒民：《新疆之商业与金融》（原文载于《新亚细亚》1935 年十卷四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历史资料集》五，第 601—625 页）、赵殿浩：《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新亚细亚》1934 年七卷六期，第 35—51 页）等。

⁷ 该发言载于民国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收国务院交抄杨增新咨呈》。参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六年至八年，新疆边防》1960 年，第 241—242 页。

⁸ 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64—265 页。

⁹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9 页。



4,001,413 卢布；与阿富汗的贸易总额为 885,040 卢布。¹在中苏贸易总额中，新苏贸易额所占的比例也日益上升。新苏贸易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上升的趋势，应该说也是新疆省政府支持的结果。

²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对新疆从苏联进口的商品数量不作任何限制，也未规定征收关税的原则。另外，还允许苏联的国家商务机关在新疆全域设立代理人（协定第三条）、允许苏联银行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商业中心城市设立派出机关（附件第二条）。³因此，有人批判它是一个“丧权辱国”性质的“密约”。⁴

新苏贸易关系的加强，使新疆省政府在财政上减轻了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它进而导致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政治影响力的下降。根据 1924 年 6 月以《中俄伊犁临时通商协定》为基础签订的《新苏暂定通商条件》，新疆省政府和苏联分别在对方领内设立了四个领事馆，⁵此外，还详细制定了一些关税方面的规定。⁶1931 年 10 月 1 日，甚至发生了以下事情：金树仁为了从苏联购买武器，未经与中央政府商量，就与苏联秘密签订了《新苏临时通商协定》。⁷

新疆“物产虽然丰富，制造只能依靠外国”。⁸这种落后的经济现状，决定了新苏贸易主要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即用新疆的农畜产品交换苏联的工业制品。⁹但是，新疆与印度、新疆与阿富汗之间的贸易内容则完全不同。¹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棉花大量出口苏联的现象。棉花生产是新疆农业的重要部门，¹¹由于苏联从新疆大量进口棉花，并通过中介人¹²向棉农支付预付款，¹³可以说当时的新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到苏联的经济生产体系之中去了。

新疆的工业商品市场，也基本上被苏联商品独占。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新疆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经过流通领域到达新疆后，价格昂贵，超过了苏联的商品。当时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途径共有三条：一是从兰州经过哈密到乌鲁木齐，全长为 1320 公里；二是从绥远经过内蒙古、宁夏到哈密，全长为 2950 公里；¹⁴三是从北京经过内蒙古、外蒙古到北京。但是其间“不仅没有一条铁路，甚至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¹⁵新疆与中国内地之间隔着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从新疆前往内地，途中甚至需要四个月的时间。¹⁶内地与新疆之间的空中航路，于 1932 年 12 月才首次开通，从 1933 年 5 月开始，才开始有了每月一个往返的定期航

¹ 李寰：《新疆研究》重庆安庆印书局，1944 年，第 155—159 页。

²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8 页。

³ 参照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报》1935 年十三卷二期，第 74—76 页。其它转载于《新疆苏俄商约之暴露》（《国闻周报》1933 年十卷三十八期，作者不详）附录。

⁴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8 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 37 页、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西北论衡》1937 年五卷六期），第 8—9 页。

⁵ 刘德恩：《驻苏联新边五领事馆初期概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三，1979 年），第 180—200 页；柴恒森：《抗战前中国驻苏五领事馆概况》（《新疆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二，1987 年），第 76—84 页。

⁶ 新疆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编：《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66—267 页。

⁷ 无名氏：《新疆苏俄商约之暴露》（《国闻周报》1933 年十卷 38 期附录），第 1—2 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 40 页。

⁸ 慕宁：《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第 48—49 页。

⁹ 《新疆问题之认识》，天津《大公报》1934 年 7 月 6 日社论。

¹⁰ 興亜院政務部：「ソ聯の觀たる新疆事情——新疆のソヴェート化に就いて」（1940 年）第 93 頁；李寰：《新疆研究》第 154—157 页。

¹¹ 关于 1927 年的新疆农作物种植面积，参照李伯藩：《最近新疆之经济形势》（《新亚细亚》1933 年五卷三期）。

¹² 该词为笔者自造。这些人受雇于从事新俄贸易和新苏贸易的贸易商，为确保棉花的收购量，他们在播种之前就与农民签定契约，并为农民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和资金，以促使农民从事棉花生产。

¹³ 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1933 年五卷五期），第 94 页。

¹⁴ 李寰：《新疆研究》，第 90—91 页。

¹⁵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 99 页。

¹⁶ 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38 页；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 48 页。



班。但是就在当年9月，新疆省政府又借口与马仲英的战争，将这唯一的航班也关闭了。¹

交通的不便，不仅严重影响了商品的流通，也使中央政府的政治影响力大大下降。中国的旅行者从内地到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般需要四个月的时间，而苏联却拥有着通往新疆的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1930年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从这条铁路的特克力车站，到新疆的边境城市伊犁仅仅只有265公里，乘汽车也是数小时便可到达。从那里乘汽车两天即可到达乌鲁木齐。²当时中国人也常常利用这一路线，经由苏联前往新疆。这条铁路的建成和使用，让许多人都有了戒备心理。孙荣元指出，“交通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最有利的工具”³海维谅的“哪个国家拥有了通往新疆最便利的交通条件，它就在新疆拥有了最强的势力”⁴等言论，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评价。很多人注意到了铁路给新疆带来的影响，⁵也有人从政治、经济、民族、社会等侧面分析了该铁路给新疆带来的不利影响。⁶，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当时就被人屡次指出。也常常有人用“鞭长莫及”一词，形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治影响力。⁷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随着与地方之间距离的逐渐拉大而逐渐下降，这与历史上中国王朝之所以建设多重型天下构造不无关系。但是，新疆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政治关系，与追求国家、国民等质性的近代国家思想却是大相径庭的。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商品独占新疆市场的现象，并没有受到新疆民众的强烈抵制。有学者分析道：交通的不便“既使中央政府感到难以指挥，也使新疆各民族感到向中央政府传达民情之困难”。⁸但是，对于“中国”国家意识淡薄的当时的新疆各民族民众来说，是否真的就有这种传达民情的愿望呢？⁹根据一位维吾尔族政客的报告，新疆许多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商人就是在新苏贸易中培养起来的。¹⁰由此可知，新苏贸易，事实上主要是在新疆与苏联的中亚地区之间进行的，所以它也就比较容易为新疆的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民众所接受。这也同时说明，新苏贸易关系起到了导致新疆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住民的“中国”意识逐渐淡漠的作用。如果看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有人将“新苏贸易”看作是苏联的经济侵略，日后新疆政治问题的发展也能够说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内地知识分子从新苏贸易中产生对苏联插手新疆问

¹ 沙秀华：《新疆航空史上的第一条航线》（《新疆地方志》1991年三期），第64页；沙秀华：《新疆历史上的第一个航空站——迪化设站经过》（《新疆地方志》1991年三期），第64页。

² 张建勋：《西土铁路对于新疆之影响及今后自保之策略》（《边事研究》1934年创刊号），第92页。

³ 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天山月刊》1934年一卷四期），第19页。

⁴ 海维谅：《国人注意不到的新疆》（《新亚细亚》1934年七卷6期）前述论文，第54页。

⁵ 关于这一点，参照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1934年一卷一期，第45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杂志》1933年一卷十期，第5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4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5页、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第8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20页、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2—53页、慕宁：《苏联与新疆的商业关系》，第41页、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第28页；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3年一卷十一期，第9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47页、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新亚细亚》1935年九卷二期），第33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第93—94页。

⁶ 参照刘湛思：《西土铁路与我国西北之关系》（《开发西北特刊》1933年一卷一期），第3—9页；张建勋：《西土铁路对于新疆之影响及今后自保之策略》。

⁷ 使用“鞭长莫及”一词的论文有：印维廉：《新疆事变的演化》（《新亚细亚》1933年六卷五期），第39页；记者：《南疆之变》（《国闻杂志》1934年十一卷九期），第2页；吉人：《今后的新疆》，第5页等。

⁸ 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上海引擎出版社，1937年），第48页。

⁹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种倾向，即过分看重土耳其系伊斯兰教民族（中国这一）国家意识淡薄一事。例如，孙翰文就曾说过：“（新疆的土耳其系伊斯兰）民族文化落后，国家意识淡薄，缺乏自立能力，制造内纷局面，给别人提供可乘之机，甚至侵略的机会”（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新亚细亚》1936年十二卷一期，第27—28页）。

¹⁰ 艾沙：《新俄关系述略》（《边铎》1933年一卷四期）第2页。



题的疑虑和忧惧，并非没有道理。

2. 日本因素在新疆“国际化”中的崛起

19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都使用“国际化了的新疆”这一说法，来说明当时围绕着新疆的复杂的国际局势。¹1933年11月成立于新疆南部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本来在思想上也受到过土耳其、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但是比较而言，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²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疆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与英国、苏联、日本等大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驻新疆的总领事馆，设在距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西南1360公里的喀什噶尔。英国人之所以设总领事馆于新疆南部，就是因为那里距印度较近，有非常多的英领印度人以喀什噶尔为据点在新疆南部经商的缘故。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在新疆南部有较强的影响力，并拥有一部分特殊权益。“有很多英领印度人定居于新疆，作为英国臣民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俄国人、德国人、阿富汗人、波斯人等外国人及偶尔从中欧、土耳其或近东来的流浪者则被要求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⁴

关于这一点，1935年奉命视察新疆后，经由印度回国的英国驻中国大使馆参事台克满（Eric Teichman）指出：“对于支那土耳其斯坦（新疆——笔者注）的政治体制来说，英国的权益有过大的倾向”。⁵但台克满认为：“英国对新疆的关心，主要在于同印度的通商贸易、在支那土耳其斯坦的印度商人的活动范围、西北国境的安宁以及从支那沿岸进入支那中央亚细亚的英国贸易等等”。⁶对于英国势力在新疆活动的性质，英国人的认识与中国学者的认识之间，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台克满的此次新疆视察，其实带着强烈的国际政治上的目的。1935年6月14日上午，当时英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贾德干（Sir Alexander George Montagu Cadogan, 1884—1968）带着台克满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进行谈话，直接提出在迪化设立领事的问题：“苏俄近有垄断新疆商务之势，据报不久即将在迪化设立领馆，本国政府深为焦虑。现正计划派员调查有无在迪化设置领事或商务官之必要，如将来有此必要，而贵国对于苏俄设领之要求予以接受时，希望贵国亦可允许本国在迪化设领。”而徐谟则满口答应：“届时自当予以考虑。”⁷6月29日，英国大使馆参事贺武来到徐谟的办公室，直接提出：“前次贾德干大使会晤贵次长时，曾提及本国政府拟在迪化设领事。现在本国政府已决定拟在迪化设领，推拟先派台克满参事趁其返国之便，前往迪化，调查该处实在商务状况后再行设领之必要。如有必要，希望贵国政府赞成此举并予以便利。”“值此苏俄政治经济力量深入新疆之时，本国政府拟在迪化设领，想亦贵国政府所赞成。”徐谟

¹ 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第44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19页。

² 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有：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39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84页；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第37页；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第44—45页等。

³ 明确主张“三十年代新疆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与英苏日三国对新疆的野心有直接关系”的文献很多，本稿主要参照：贺扬灵：《破碎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4年二卷八期）、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西北论衡》1937年五卷六期）、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新亚细亚》1934年七卷五期），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等。

⁴ 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神近市子訳、岩波書店、1940年、第123頁。

⁵ 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23頁。

⁶ タイクマン：『トルキスタンへの旅』，第10—11頁。

⁷ 《徐总长会晤英使贾德干谈话记录，时间：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上午十时，事由：迪化设领事》，《外交部档案》《英人台克满有利新疆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66.3/0001。



答道：“本国政府根本政策，即在维持开放门户主义。迩来所得新生报告，实有令人感受不安之处。贵国拟在迪化设领，与本国政府政策相符，自极欢迎。”¹可见英国对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很是在意。

当时的中国学者认为，英国势力在新疆活动的目的，一是要防止苏联势力威胁印度或西藏，二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南部的既得权益而积极活动，欲在新疆南部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权。陈言分析认为，英国势力的具体手法是，煽动民族的独立情绪，制造民族对立的局面。²尽管目前尚未找到能够直接证明英国政府与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有着特别关系的资料，但许多人都相信，1933年在新疆南部爆发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运动”，就是英国人对当地维吾尔居民进行煽动的结果。³

毫无疑问，因为与东印度之间的地理关系，英国曾经一度想把新疆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与俄国成为竞争的对手，并且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就已经开始出现对立。⁴很多中国学者在分析干预新疆的各种外国势力时，都很重视英俄（英苏）对立的性质。然而在他们的口中，苏联的影响力在1920年代以后显然大大超过了英国。一部分人甚至指出，有关英国支持了新疆南部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出自于苏联之手。⁵也有人指出，苏联通过它在各地的领事馆在各民族中积极培养亲苏分子。⁶苏联势力渗透新疆的方式与英国不同，英国是在民众的阶层培养反政府人士，苏联则与此相反，它是利用中国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政治野心，帮助他们在新疆构筑一个不得不接受其经济渗透的政治体系和财政体系。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与英国的较量中，苏联能够占到较大的优势。因为苏联可以通过在新疆的苏联国家贸易机构独占新疆市场，在经济和通商贸易方面获得最大的权益和利益。⁷很多文章都提到，新疆与苏联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新苏贸易）实际上就是苏联的经济侵略，指出苏联在新疆设立银行和贸易公司，就是苏联进行经济侵略的实例。⁸

中国社会中关于新疆被“国际化”的舆论，1930年代前期多集中于强调“来自苏联的威胁”，以后则是更多地注意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尤其是1935年以后，指出日本觊觎新疆地区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换言之，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孟英庚的《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认为：日本在取得中国东北四省以后，国际形势随之一变，英俄的对日态度立即恶化。日本既要防备英国（的军事行动）、又要着手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同时也是为了

¹ 《徐次长会晤英大使馆贺武参事谈话记录，时间：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地点：政次室，事由：英国拟在迪化设领事》，《外交部档案》《英人台克满游历新疆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至二十五年四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66.3/0001。

² 陈言：《新疆俄英日三国角逐之形势》，第10页。

³ 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41—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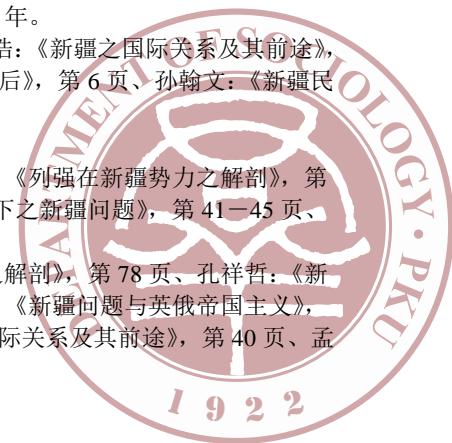
⁴ 参见王柯：《从满清王朝到中华国家—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与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99期，2007年，40—53页。全文转载于《民族学与社会学通讯》Sociology Ethnicity，第69期，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2010年，5—16页。另外，也可以参考拙著《中国，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2014年。

⁵ 关于这一点，参照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5—46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38页、贺扬灵：《破碎的新疆》，第35—36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6页、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第37页等。

⁶ 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前述论文，第23页。

⁷ 关于这一点，参照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0—53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4—76页、庄心在：《新疆与苏俄之关系》，第27页、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1—45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22页等。

⁸ 参照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5—6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8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5页、孙荣元：《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主义》，第22页、曾问吾：《苏联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第50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40页、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2页等。



防止中苏两国联合，就开始密切注意英国和苏联的争夺对象——新疆。¹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之所以认为日本势力已经开始威胁新疆，其背景首先就是，以满洲事变为出发点中日关系起了质的变化。1931年满洲事变以后中国社会中抗日运动思想的高涨，就是产生这种认识的社会根据。

另一个例子是曾廷仲的《列强在新疆势力之分析》。该文分析道：日本的计划是独占满蒙，并将华北划入其势力范围之内。然而，要实现上述计划，就必须侵略新疆，建立起与英国、俄国之间三足鼎立的侵略关系。²这里所说的“侵略新疆”，很明显，指的是对新疆进行军事侵略。这种说法，与许多人的“英国和苏联通过对新疆省民众或政府的影响和渗透，图谋对新疆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它要告诉人们，日本带给新疆的威胁才更大更可怕，比起英俄（苏）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对于日本来说，处于亚洲内陆地区的新疆地区的意义，与其说是在中日关系、还不如说是在日俄、日苏关系的背景下而被认识的。日俄战争以后，由于从沙皇俄国手中接过了所谓的“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日本开始与俄国在中国北方地区进行势力角逐，因此与“满蒙地区”相接壤的新疆所具有的战略价值才开始进入日本军国主义的视线里。日本的大陆政策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日本国家的大陆化和经营“满洲”，而“满洲”及其以西的地区日后都是受到苏联“赤化”的地区。³直到1930年代之前，日本侵略势力并未直接实际涉足新疆。⁴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可以断定1930年代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新疆的担心完全属于空穴来风，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的确有企图将新疆也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势力。而这一点到了中日战争时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具体，例如“回教圈研究所”所长大久保幸次，在1939年曾以《作为一个回教研究者》为题，通过东京中央放送局的无线广播以阿拉伯语向中国国的伊斯兰教徒发出呼吁：“在此众多的回教各民族已经觉醒、而为亚洲的再生为目标而腾飞之时，衷心期待诸君也能奋起，与日本人一起为建设东亚地区的和平助一臂之力。”“深深切望诸君遵循防共精神，理解日本圣战的真正意义，与我们一起为东亚的正确的和平建设发挥神圣的作用”。⁵

本书在《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一章论证，当时日本的伊斯兰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而当时日本所称的“中国的回教徒”中，自然包含着新疆的突厥系伊斯兰民族居民。通过日本政府外务省的协调和帮助，日本的“回教研究家”们进行了许多关于新疆政治、社会、国际关系，尤其是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例如日本外务省调查部所编辑的《回教事情》就刊登了许多关于新疆的文章，例如第1卷第2号的《新疆事情一斑》、第2卷第4号的《清初的对回教政策》、《新疆的东部前线“哈密”》和《英国经营新疆的历史与现状》，第3卷第3号的《杨增新的对回教政策》、《清初新疆的燕齐和回屯》即《帝政俄国的新疆经略及特性》等。

¹ 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第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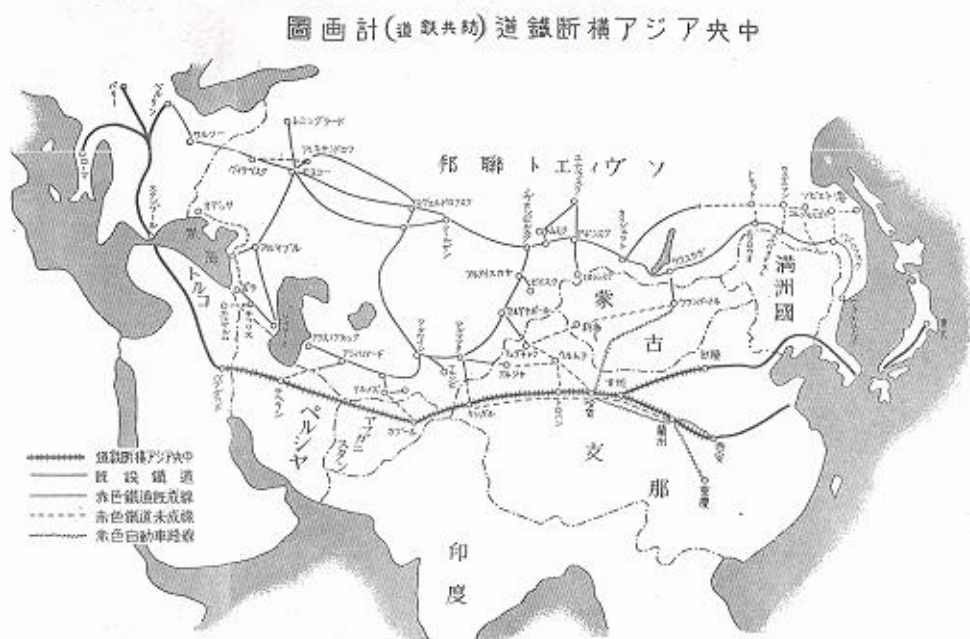
² 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82页。

³ 如：《11 外蒙及新疆の近況 昭和10年3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826900、陸軍省調査班調製史料綴(滿支關係) 昭和6. 11~10. 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又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1327300、第六十四議會用調書、下卷(B-議 OB-2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的第六章《对「ソヴィエト」連邦關係ヲ中心トスル滿州事变及之ニ關係アル諸問題 / 6、滿州国ト「ソヴィエト」連邦トノ關係》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3081327400、第六十四議會用調書 下卷(B-議 OB-2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中的第七章《对「ソヴィエト」連邦關係ヲ中心トスル滿州事变及之ニ關係アル諸問題 / 7、「ソヴィエト」連邦ノ蒙古及新疆方面ニ於ケル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满洲问题上注意到蒙古（包括外蒙古地区）和新疆的价值，而且将这两个地区并列在了一起。

⁴ 关于近代日本向中国新疆地区的渗透，可参见王柯：《东突厥独立运动，1930年代-1940年代》第三章《反日亲苏政策的表与里——盛世才的政治路线与新疆民族问题》，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105-106页。

⁵ 大久保幸次：《支那回民諸君に告ぐ》，《回教圈》三卷一号，1939年，第3页，第5页。关于大久保幸次和他的“回教研究所”，参见本书

而在这些研究中，有人提出：新疆（東突厥斯坦）不过是“汉民族的一大殖民地”，¹因此新疆的伊斯兰居民不仅自然具有亲日与反共的情绪，而且具有清冽的反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情绪。²以此“研究成果”为立论根据，1939年时有人提议建设一条“防共铁道”——穿越新疆的中亚横断铁路：“这条线路的建设，在避免与俄国势力的激烈冲突并且可以在甘肃省内巧妙地遮断红色通道、援蒋通道，给予在新疆南部地区一直反抗着蒋政权和苏联的压迫，与共产主义进行血腥战斗的孤立无援的可怜的回教徒以光明，将他们变为日本的同伙上，都是一条有益的线路。”³



出处：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东亚交通社，1939年。

从表面上看来，日本的“回教研究家”们担心新疆的伊斯兰居民受到苏联和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压迫，或者是因为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使东亚的安定受到威胁：“今日的支那西北地带，位于蒋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联络要冲的支那的西北一角，如果出现被抗日的回教徒所操纵的事态，就会给东亚的安定带来暗影。正是因为如此理由，我们从兴亚的立场、以及防共的角度出发，对于这片被看做世界的“谜地”而置于片隅的支那的西北边境，不，说是支那但又不是支那的处于半独立氛围包围之中的回疆，必须给予高度注意。”⁴然而事实上，新疆在中日战争时期受到日本政府的伊斯兰研究机关以及日本的“回教研究家”们重视的理由，还是在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胜利、甚至称霸于回教世界的问题：“掌握了南新疆的回教徒就意味着掌握了全新疆的回教徒，抓住了全新疆回教徒的心也就可以抓住全世界回教徒的心。”⁵

日本侵略势力与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之间，的确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然而并不能依此断定日本侵略势力没有插手新疆的企图。1941年的《回教世界》第3卷从第1号到第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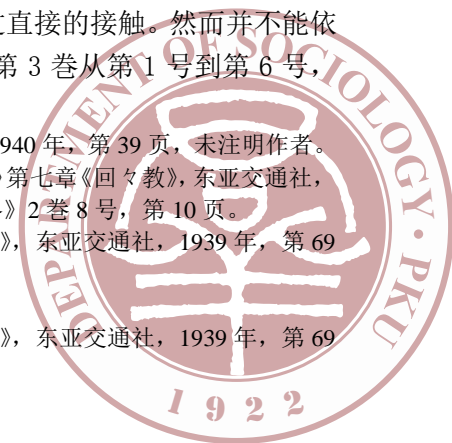
¹ 《帝政ロシアの新疆経略との特性》，外务省调查部：《回教事情》3卷3号，1940年，第39页，未注明作者。

² 铁道监察官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第七章《回教》，东亚交通社，1939年；马渊修：《抗戦下支那回教徒の動向》，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世界》2卷8号，第10页。

³ 铁道监察官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东亚交通社，1939年，第69页。

⁴ こばやし・はじめ「回疆」，《回教圈》2卷4号，1938年，89页。

⁵ 铁道监察官汤本升：《中央アジア横断鉄道建設論——世界平和への大道——》，东亚交通社，1939年，第69页。



连载了脇坂利徳的《新疆独立戦の回顧》的长文，记载了从 1820 年代的张格尔叛乱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东突厥独立运动的历史过程。按照作者的说明，该文是他“以麻木提师长及其多位忠实部下口述的生动体验为经，以笔者本人的研究和收集到的资料为纬而成”。¹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是在哪里接触到这些维吾尔族的，但是由于说明根据麻木提在反盛世才的叛乱失败之后流亡国外的口述的亲身体验而成，所以可能就是在麻木提的代表 1941 年 10 月到上海时主动向日本领事馆报告的内容。²该文作者对维吾尔民族的命运表示同情，但是在连载第一期的开头部分即强调：“今天，日本在所占领的大陆地区已经承认长出新芽的新国民政府。为了排除中国共产党的抵抗，我鹰鹫远程空袭赤都兰州。而居住于亚洲干燥地带的五千万图兰民族³，与世界四亿的穆斯林（回教徒）之间具有精神的连带，因此有人说能够掌握新疆者即能够掌握亚洲，所以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考虑掌握东突厥斯坦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⁴

通过保存在日本防卫研究所中的旧日本军方档案，可以看出当年日本军方曾积极开展对新疆的情报搜集工作。例如 1940 年 9 月，多田部队本部曾经提交过《新疆各族之研究》（两部）；⁵1941 年 6 月蒙古军事顾问部又提交了《青海、新疆省方面情况调查书》，他们使用了一位名为“阿布都拉阿奇（アブドラアチ）”的人调查了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的情况、新疆省的道路和航空线路、电力情况、无线电通信情况、电话通信情况、家畜出口情况、各种政情及军队驻地和具体兵力部署等，又使用了一位名为“祖农·阿希尔（ズノン・アシエル）”的人在甘州调查了从 1941 年 3 月开始的 85 天时间内所通过苏联卡车的数量，我们知道这些苏联卡车都是向中国内地运送援助物资的。而从名字上来看，这两位日本军方的情报人员应该都是维吾尔族人。⁶

日本与流亡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麻木提的接触，也能够说明日本军方和政府的确对将新疆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产生了兴趣。1937 年春天麻木提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后，一度到土耳其与日本驻土耳其使馆取得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察觉到麻木提一直与日本方面保持联系的印度政府发出驱除令，麻木提在各地日本使馆的帮助下乘坐日本邮轮远山丸途径上海于 1942 年 4 月 1 日来到了日本，之后在东京联系到上海、呼和浩特、印度和中东各地的维吾尔族人，建立了“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思想”的组织。⁷

3. 近代国家“边疆”之意义

在镇压了 1928 年 7 月 7 日的政变之后，原新疆省民政厅长金树仁成了新疆新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到 10 月末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没有对金树仁发表“新疆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实际是

¹ 脇坂利徳：《新疆独立戦の回顧》（1），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世界》第 3 卷第 1 号，1941 年，50 页。

² 关于麻木提的代表 1941 年向驻上海日本领事馆报告的经过，参见蒙古军事顾问部调查部：《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第 2 章 マフムツドの対日工作の実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500、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 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关于麻木提发动叛乱失败流亡印度一事，参见王柯：《东突厥独立运动，1930 年代-1940 年代》，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年，105-10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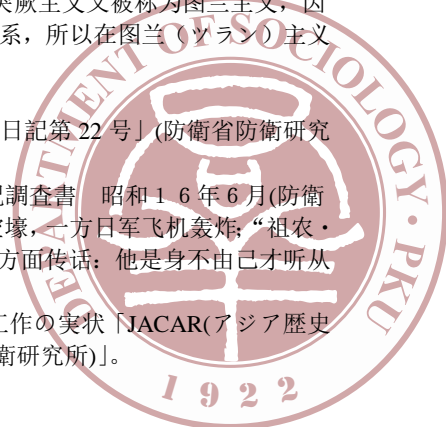
³ 图兰民族，泛指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民族，19 世纪的鞑靼族知识分子提出的泛突厥主义又被称为图兰主义，因为日语、满语、蒙古语、朝鲜语、维吾尔族等突厥民族的语言均属于阿尔泰语系，所以在图兰（ツラ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时被日本的学界用来为日本侵略大陆辩护。

⁴ 大日本回教协会：《回教世界》第 3 卷第 1 号，1941 年，51 页。

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91682700、昭和 15 年「陸支普大日記第 22 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08900、青海、新疆省方面情况調査書 昭和 16 年 6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阿布都拉阿奇”报告说新疆省政府命令全疆各地都要挖防空壕，一方日军飞机轰炸，“祖农·阿希尔”在行动中得到了马步芳的帮助，马步芳拜托“祖农·阿希尔”向日本方面传话：他是身不由己才听从重庆方面的命令的。

⁷ 蒙古军事顾问部调查部：《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第 2 章 マフムツドの対日工作の実状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21598500、回疆独立運動の概説 森川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追认)。¹杨增新时代由省长兼任的“新疆边防督办”一职，也一直迟于1931年6月6日才正式任命给了金树仁。²通过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谭延闿等人写给广西回族军阀白崇禧的信件，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在内的多名南京国民政府要人在内，都曾经考虑趁此新疆最高权力交替之机，派白崇禧率领军队进入新疆，一举打破新疆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局面。³

白崇禧最终也没有能够进入新疆。其原因有二，一是金树仁的拼命反对，另一是中国内战的爆发，桂系军阀当然不愿因新疆问题而分散兵力和精力。⁴如前所述，新疆的政治独立并不仅仅是一个军阀个人权力欲望膨胀的结果，除人为因素外，也有当时国民政府实际上并不具备统治新疆的实力，以及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这些因素，从白崇禧给胡汉民、谭延闿等人的回信中也可以看出。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又发生了由督办公署参谋处长陈中等人策划的政变。趁此机会，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一度提议以天山为界，将新疆省分成南北两省。这个提案，因为并不能成为一个解决新疆政治独立问题的现实方案而没有实行。⁵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直到1933年7月前，就追认由发动政变者一方推选出来的临时省主席刘文龙和临时边防督办盛世才之事一直不肯松口，而是派参谋次长黄慕松作为“国民政府宣慰使”，率领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庞大的随员团前往新疆，摆出了一副准备接收新疆政权的架势。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收回新疆政治权力的企图，因盛世才实行了坚决的反击——发动“二次政变”、逮捕和杀害了“4、12政变”的领导人以对南京国民政府宣慰使团实行“杀鸡儆猴”而告破产。7月10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在行政院会议上色厉内荏地说到：“中央的新疆政策是：第一，实现外交上与中央政府的统一；第二，实现军事上与中央政府的统一；第三，承认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新的人事任命也以此为条件，任命能执行上述政策之人”，⁶虽然到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发表了对刘文龙和盛世才的任命，但是在对任命新统治者一事上所表现出的态度中，已足以令人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实现新疆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统一的强烈心情。

值得注意的是，“4、12政变”以后，中国大量的学者也踊跃发言，分析新疆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为打破新疆的政治独立局面而出谋献策。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新疆社会动乱不断的原因，虽然着重点各种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指出了新疆政治的腐败、新疆经济的崩溃、少数民族与中国内地移民的对立、外国势力的介入、因交通不便而处于与内地隔绝状态等问题。⁷他们

¹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2076页。

²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027页。

³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011—3018页。

⁴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第3012—3022页。

⁵ 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第29页。

⁶ 蒋默掀：《新疆政变又揭开一幕》，第62—63页；印维廉：《新疆事变的演化》，第39页。

⁷ 印维廉举了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这两条；天津的《大公报》及孔祥哲和余贻泽除了政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还举了民族间的对立（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4—46页；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第26—28页；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6日社论）；苏大成所举的三条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民族间的对立和经济问题（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第41—42页）；葛绥成所举的三条是外国势力的介入、民族间的对立和交通不便（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第7—9页）；吉人、傅筑夫、赵镜元和郭维屏所举均为四条。吉人、赵镜元和傅筑夫举的是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破绽、民族间的对立和外国势力的介入（傅筑夫：《新疆民族问题》《天山月刊》1934年一卷三期，第2—5页；吉人：《今后的新疆》第4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杂志》1933年一卷十期，第1—6页）；郭维屏所举的四条是政治的腐败、民族间的对立、外国势力的介入和交通不便（郭维屏：《南疆事件帝国主义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1934年一卷一期，第45—48页）。黄寿慈等人特别强调了建设从内地到新疆交通线的重要性（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第22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1933年五卷五期），第94页）。

一致认为，“412 政变”发生的直接契机是新疆的民族间的对立抗争，但民族对立起源于新疆政治的腐败，而新疆政治之所以腐败就是因为金树仁实行独裁。基于这一共同认识，这些学者们几乎一致指出：处理新疆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改造新疆的政治，结束新疆的政治独裁状态，组织一个能够服从中央政府的新的新疆省政府。而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他们提出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派遣大员论”，一种可以称之为“派遣军队论”。主张派遣中央大员的人们认为：应该派出中央政府要员以“宣抚”为手段，实现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统一。¹与此相反，主张派遣军队的人们认为：应该派出中央的军队以压力为手段，实现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统一。²

“派遣大员论”与“派遣决定论”二者的背后其实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如何解决新疆的民族对立的问题。“派遣大员论”同时主张对当地民族进行“宣抚”，以使民族问题逐渐沉静；“派遣军队论”则明确主张，防止外国势力的介入也是派遣军队的目的之一，而对于民族的对立和抗争，只有通过镇压的方式来彻底解决。例如，孔祥哲就认为：“愚民不知感恩，唯有以法管理”，所以为镇压民族叛乱，应当派军队驻屯于各地。³然而，尽管两种意见相左，但是却都普遍认为，要想彻底解决新疆的民族问题，最终只有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因此，有人以“民智不开”为理由，主张在新疆整顿学校教育，⁴其目的实际在于从文化上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⁵新亚细亚学会提倡“文化的融合”；⁶赵镜元更明确提出，应该对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子女同时进行汉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教育，以便“冶汉回于一炉”。⁷

从这些学者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解决新疆的政治独立的问题。相对而言，民族问题、经济问题、交通问题及外国势力的介入等问题，都被看成为其次的问题。⁸这也许与“4、12 政变”之后新疆处于政治敏感时期有关，但是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当时中国内地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解决新疆问题的办法，其性质都是以消除一切可能使新疆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和民族上实现独立的因素，从而加强新疆与中国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以及人与人的纽带联系为目的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社会所认识到的新疆问题，决不是新疆地域社会内部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按照近代国家的理念所追求的使边疆地区与内地如何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在文化上实现同化、在经济上实现统合，从而保障作为边疆的新疆永久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问题。

那么，对于追求成为一个近代国家的中国来说，处于边陲的新疆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要人与学者们的言论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新疆的直观认识，首先都是注意到它的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一面。⁹新疆的石油资源，在二十年代就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¹⁰其黄金等贵金属的蕴藏量，也受到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注意。¹¹“中国是世界上

¹ 该词为笔者自造词。关于要员派遣论，参照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28页、天津《大公报》1934年7月6日社论、丁道衡：《对于新疆乱事的一个紧急提议》（《独立评论》1933年四十九号）第8页。

² 该词为笔者自造词。关于军队派遣论，参照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第21—22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6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第96—99页。

³ 同前无名氏论文，第94—95页；同前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6页。

⁴ 印维康：《新疆事变的演化》，第31页。

⁵ 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年一卷五期，第47页。

⁶ 新亚细亚学会：《敬送黄专使赴新宣慰》（《新亚细亚》1933年五卷六期），第2页。

⁷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5页。

⁸ 也有人主张新疆问题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与民族问题无关。关于这一点，参照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4页。

⁹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3—5页。

¹⁰ 龚学遂：《新疆油矿与世界石油问题》（《学艺杂志》1924年六卷二号），第1—3页。

¹¹ 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96—97页。



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新疆又是全中国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¹有人指出：“（新疆）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在大战期间是我们中国的生命线，是我们民族复兴的根据地”。²

新疆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的价值，在于可以用新疆来安置大量的移民，以解决中国内地人口的过剩问题。赵镜元毫不掩饰地指出：“新省又是一个人口宣泄地，……可以调剂内地过剩人口”。³学者们以新疆政治独立的历史为鉴，从他们所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都非常重视振兴新疆的经济。他们建议国民政府在新疆采掘地下资源、开设现代化工厂、建设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开垦和扩大农地、保护内地商人的活动等。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中国内地人口移居新疆，看成是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⁴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褚民谊也在杂志上刊文，就解决“新疆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设想，其主要内容为：在中央政府内设立专门的“西北建设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中设国道局、劝业局、采矿局、垦殖局等，分别负责处理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交通整备，促成新疆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采掘和利用新疆的地下资源，办理中国内地住民移居新疆等事务。⁵

中国内地人口移民新疆的问题，早在 1933 年“4、12 政变”之前就已经被提出过。⁶例如，1928 年，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就预料二十年后中国内地将会出现人口过剩的问题，他因而主张，为使新疆能够在将来成为内地过剩人口的移居地，从现在起就应该做出打破新疆政治独立状况的努力。⁷一部分人的主张中甚至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移民新疆除了是能够发展新疆的经济以外，同时也是改变新疆住民的民族构成，以求达到一劳永逸、彻底断绝新疆民族问题的办法。⁸到了 1933 年，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罗文干更提出了一个“一箭四雕”的建议：驱使中国内地的服刑者修建由内地通向新疆的道路，在道路开通以后，让服刑者定居于道路沿途并从事农业开垦。这样，除了在建设交通和开垦农业上可以得利以外，还可以净化内地社会，并可以借此改变新疆居民的民族构成。⁹

中国内地人口移民新疆的问题，与其说这是一种“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倒不如说是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利益出发的一种考虑。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中国内地过剩人口移民新疆，已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根据 1932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内地农耕地面积减少问题非常严重。每户农家耕种的农地，全国平均为 22 亩，而在南方的湖南省和广东省则只有 12 亩。加上农村的阶级分化日益严重，大部分农地被极少数的地主所占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占农村以至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不安定因素。¹⁰1936 年的谢友萍的论文《西北移民问题》，在分析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指出：为了消除中国社会中的这一不安定因素，就有必要不间断地进行移民。

¹ 关玉衡：《新疆民族问题研究》（《凯旋》1948 年三十四期）第 28 页。

² 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 年一卷五期，第 48 页。

³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 3 页。

⁴ 主张从中国内地向新疆移民的文献非常多。如：蒋默掀：《新疆大局须彻底清理》（《时事月报》1933 年九卷三期，第 90 页）；李大璋的：《整理及开发新疆之意见》（《新亚细亚》1935 年九卷三期，第 73—74 页）；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97—98 页；黄寿慈：《处理新疆事变刍议》，第 22 页；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 3 页；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 年一卷五期，第 47 页；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3 年一卷十一期，第 10 页；苏大成：《新疆之立体研究》续，第 42 页；作者不详《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第 100 页）等等。

⁵ 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85—99 页。

⁶ 于去疾：《新疆屯垦及今后之计划》（《新亚细亚》1931 年二卷一期），第 28—32 页。

⁷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3013 页。

⁸ 孔祥哲：《新疆事变及目前应有之补救》《开发西北》1934 年一卷五期，第 47 页。

⁹ 蒋默掀：《新疆大局须彻底清理》（《时事月报》1933 年九卷三期）第 91 页。

¹⁰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西北向导》1936 年十二期），第 107 页。



20 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移民，其移居地点基本上集中于北部“边疆”地区。据 1932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全国范围内，每户农家平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是东北地区，黑龙江省高达 103 亩；其次是西北地区，新疆平均每户为 40 亩。此外，未开垦的荒地也数东北和西北最多。由内地移居东北地区的移民，从 1923 年到 1930 年，共计达到 500 万人以上，其中仅 1930 年一年就达一百万人以上。然而，“满洲事变”爆发以后，向东北地区的移民活动基本上全面停止。可就在此时，中国内地又开始出现了大量灾民。因此，向西北地区移民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意义。¹关于西北移民的意义，曾有人这样解释道：“内地有人满之患，西北有土荒之忧”。²当时所说的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和新疆省。³四省现有农地可容纳的移民总数，据翁文灏的推算大约为 550 万人，其中新疆可容纳 300 万人。四省之中，新疆的人口密度最低，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 0.5 人，未开垦的荒地也有很多，⁴具有接纳大量内地移民的能力。因此，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所说的“移民西北”，实际上就是“移民新疆”。

18 世纪以后，由人口增加引起的土地不足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马尔萨斯对于人口问题的论证，正是基于这种现实。欧洲各国之所以展开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拼命扩张领土，也是以此为背景的。从世界规模来看，土地不足的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有所缓和，然而，中国的人口却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可以说，相比而言，开辟新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来解决人口增加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才是最为迫切需要的，而中国因此将视线投到了“边疆”地区。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学者的心目中，中国内地人口迁移到边疆地区，并不仅仅是一个解决中国内地人口过剩的问题，其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充实国防”。⁵这一点，从使用服刑者建设通往新疆的交通线，开垦新疆农业，并进而达到净化内地社会、改造新疆居民民族构成的提案，竟然出自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之手一事之中就能够得知。所以，谢友萍也在其文章中把罗文干的提案称为是“寓军事于农业的军事农业政策”。⁶

“移民实边”这样一个在中国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古老的话题，之所能够在追求近代国家的 20 世纪 30 年代重新焕发出强烈的生命力，毫无疑问，就是因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和学者们都看到了“边疆”在国防上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开发西北，即所以巩固新疆地位。”⁷那么，新疆在中国的国防上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关于这一点，当时谈论到这一问题的南京国民政府要人和中国的学者们，几乎都援引了当年左宗棠的主张。⁸1881 年，当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向清王朝的皇帝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他认为，在国防问题上西北边疆甚至比东南沿海地区更为重要，为了防止英国、尤其是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必须认真重视新疆问题。在左宗棠的率领下，清朝军队赶走了来自于中亚细亚的浩罕地区侵略者阿古柏伯克，恢复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

但正如当时部分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新疆的形势已与清末的左宗

¹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8 页。

² 缪其实：《平绥铁路西展问题》（《西北向导》1936 年九期），第 41 页。

³ 当时的中国西北，包括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和新疆省这四省；现在所说的西北地区，是除了这四省之外又加入了青海省。

⁴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5—108 页。

⁵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4 页。

⁶ 谢友萍：《西北移民问题》，第 104 页。

⁷ 原文为“开发西北，即所以巩固新疆”（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81 页）。

⁸ 引用左宗棠的发言以说明新疆的重要性的文献，仅笔者所见就有：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时事月报》1935 年十三卷二期，第 71 页）；印维廉前述论文，第 31 页；赵殿诰：《新疆之国际关系及其前途》，第 35 页；葛绥成《内忧外患的新疆》《新中华杂志》1933 年一卷十一期，第 7 页；庄心在前述论文，第 30 页；李大璋前述论文，第 67 页；苏大成前述论文，第 59 页；孔祥哲前述论文，第 48 页；褚民谊：《新疆事件与开发西北》，第 83 页等。



棠时代大不相同，已经陷入于更加复杂的状况之中”。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人对于新疆的认识，当然要比左宗棠的思想更进一步。具体说来就是：尽管继承了左宗棠“中国国防重点在于西北”²的思想，但西北的概念自身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当年左宗棠所说的西北边疆，所指的仅仅为“新疆”与“蒙古”地区，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文章中所论及的“西北”，实际上是“西”加“北”，即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经过北部的蒙古、西北部的新疆、最后直到西部的西藏，已变成了一个包括了上述四个地区的概念。然而，由于从地理上这四个地区完全环绕着内地，所以关于“边疆”的内涵、尤其是“边疆”在国防上的价值，很难说南京国民政府与学者们超越了当年左宗棠的认识。

关于在国防上这四个地区的相互关系，顾季伦指出是“唇齿相依”。³很明显，当时国人把这四个相互连接的地区、即西北“边疆”，仍然看作是一道保卫中国内地不受来自西边和北边的外国列强侵略、威胁的屏障和堤防而已。而在这道由“边疆”构成的屏障和堤防当中，新疆之所以备受重视，就是因为它处于东北与蒙古相接，西南与西藏相连这样一个中心位置。⁴然而，当时“满洲”已经完全进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外蒙古又进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西藏也事实上处于一种政治独立状态之中。随着对上述三个地区实际控制权的丧失，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不仅成为中国内地移民的唯一去路，也成为中国内地可以用以躲避遭受外来势力直接侵略的重要地区，“一旦失去新疆，中国也就要面临危险”，⁵历史从未象当时这样赋予新疆如此重要的意义。⁶而这种意义，却完全是按照服从于中国内地利益的“边疆”的意义上所理解的。

结语

何为“边疆”？在1930年代中国国民的心目中，“边疆”其实并非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概念。吴文藻当时曾经进行过整理，他指出：“国人之谈边疆者，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一是文化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例如中国现在的国界，三面是陆界，一面是海洋界。故高长柱对边疆所下的定义有云：‘凡国与国之间标示其领土主权之区别者，曰“国防线”；接近“国防线”之领域，即边疆也。’”（见《边疆问题论文集》，第1页）。这显然是政治上的边疆观。又胡焕庸所著国防地理与国防诸书，则代表地理上的边疆观。“通常称边疆为‘塞外’、‘域外’、‘关外’，而称内地为‘中原’、‘腹地’、‘关内’。二者相对者言，亦都代表了政治及地理的观点。然而国人另有一种看法：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并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成为边疆，这明明不是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⁷

从吴文藻的解释中可以知道，所谓“边疆”，其实也就是文化上具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地区。关于少数民族与中国国家之关系，当时就有人指出，因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占中国国土面积的70%，因此，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国体来说，少数民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⁸南京国民

¹ 方秋苇：《中国边疆问题十讲》，第44页。

² 例如，胡汉民说：“中国国防在北不在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2页）；谭延闿说：“中国国防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3页）；白崇禧说：“中国国防，重在西北”（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5页）等。

³ 顾季伦：《整理新疆刍议》（《新亚细亚》1936年十一卷三期），第13页。

⁴ 关于新疆在中国边境地带占有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这一认识，参照孟英庚：《英俄日角逐下之新疆问题》（《新亚细亚》1935年九卷二期）第33页、曾廷仲：《列强在新疆势力之解剖》，第71页、顾季伦前述论文，第13页、孙翰文：《新疆民族鸟瞰》，第27页等。

⁵ 余贻泽：《新疆问题之症结》，第28页。

⁶ 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第1页；吉人前述论文，第4页。

⁷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林恩显编：《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国立编译馆主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204页，原载《边政公论》第一期第5、6期合刊，1942年1月。

⁸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5页。



政府的大员更加直接地说道：中华民国的国体应该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因此，没有了满族、蒙古族、藏族及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华民国这个“中国”也就不复存在。¹从这里可以看出，包括许多国民政府的要人在内，在当时许多人的想像中，中国是由明确区分开的两个部分——汉民族居住的“内地”部分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所构成的。²许多强调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甚至直称这些“边疆”地区为“屏藩”地区。由此可见，1930年代中国的“边疆”概念中，其实具有“边缘”与“差异”的双重含义。“边缘”也是一种临界状态，而建筑在这种“边缘”意识之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一种内外有别，而且意味着“内地”和“边疆”之间的一种主从关系：在地理上，前者为中心，后者为周边；在文化上，前者先进，后者落后；在经济上，后者应该服从于前者的利益；在国防上，后者是一个保卫前者安全的存在而已。在1930年代的国家利益至上的“边疆”意识中，中华民国实质上被想象成了一个“二重的”国家，而对“政治统一”的追求，不过是一个实现上述理想状态的手段而已。

这种“边疆”意识中的中国国家想象，令人不能不联想到多重型“天下”体制中“中华”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边疆”与英语中的 frontier、borderland 之间是否具有对应关系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中国一个极为古老的概念，³它的诞生与古代中国所想象的多重型天下中的“五服制”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于“边疆”的传统思想，不但在进入中华民国时代以后也没有减弱，反而在20世纪30年代中得到了加强，这与当时中国受到外敌侵略、中国国民产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感之间不无关系，即使在没有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疆，“边疆”话语的再起也与当时日本的侵华行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书讯】

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族体、语言与政策

——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5月

何俊芳 著

目 录

第一编 族体理论的构建及反思

俄国学者史禄国对“族体”诸问题的研究

古米廖夫对族体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勃罗姆列伊的族体理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对族体问题的探讨和反思

第二编 相关概念界定与探讨

俄语中的族类概念

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

对 ethnicity（этничность）的引进及阐释

¹ 最有代表性的是胡汉民的发言。关于这一点，参照胡汉民给白崇禧的信。原文载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012—3013页。

²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第4—5页。

³ 一般认为，“边疆”最早出自于《左传·昭公十四年》，其中有“好於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一语。

